

中国农村金融成熟度的测量与实证研究

贾立¹, 汤敏², 胡晶晶¹

(1.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2.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 借鉴 CMM 模型, 以 1978—2013 年的中国农村金融运行数据为研究对象, 构建农村金融成熟度模型, 用于测量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轨迹, 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农村金融成熟度总体保持上升趋势, 且在 2007 年以后出现加速上升趋势, 但也存在波动; 规模、结构以及效率指标对我国农村金融成熟度的贡献差异较大, 其中规模维度占据主导作用, 凸显了我国农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各层面协调发展的特征。

[关键词] 农村金融发展; 农村金融成熟度; 主成分分析法; “三农”问题; 农村经济增长; 农村普惠金融体系

[中图分类号] F830.5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3114(2017)01-0021-08

一、引言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 “三农”问题一直备受关注^①。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农村金融的协调和支持能够减少农业生产的资金借贷成本, 提供资金保障, 因此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是提升我国农村经济的保障和基础。事实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在数量上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如图 1 所示, 农业贷款由 1978 年的 103.51 亿元上升到 2013 年的 4.5 万亿元左右^③, 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18.4%, 共增长了近 435 倍; 乡镇企业贷款由 1978 年的 34.7 亿元增长到 2013 年的 21482.2 亿元, 年均增长速度更是达到 19.5%, 共增长近 619 倍。在中国农村金融业在数量上迅速增长的同时, 农村经济增长也是十分明显的, 1978—2015 年, 农村 GDP 由 1235.8 亿元增长到 16.6352 万亿元, 年均增长约 14.5%, 增长近 135 倍^④。那么, 这是否就说明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 中国农村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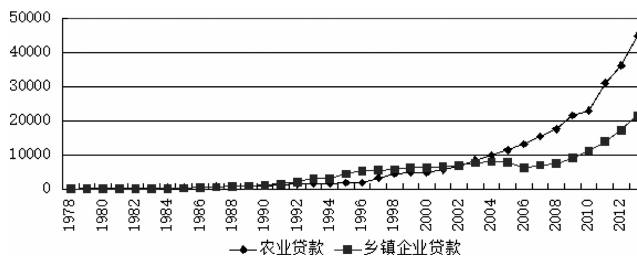


图 1 1978—2013 年中国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②

[收稿日期] 2016-06-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JY083)

[作者简介] 贾立(1971—), 女, 河北张家口人,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市场、农村金融; 汤敏(1991—), 男, 湖南衡阳人,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职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互联网金融; 胡晶晶(1992—), 女, 甘肃兰州人,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

①中国自古以来是农业大国, 农业文明历史悠久, 农业经济一直是经济的主要构成, 农村人口始终占人口的主体部分。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得到高速发展, 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改革初期的 34% (1978 年) 降低到仅仅 9.7% (2014 年), 但是与此不成比例的是, 农业劳动力仍然占了全国从业人员的 40% (2014 年), 农村人口在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仍占近 60% (2014 年), 全国依然有一半人口依赖仅占生产总值 9.7% 的农业为生, 这说明农村和农民问题依旧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问题, 也说明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②资料来源于《中国金融统计年鉴》(1978—2013 年) 和《中国乡镇企业统计年鉴》(1978—2013 年)。

③2010 年起, 中国统计年鉴口径改变, 农业贷款项目取消, 此后三年数据笔者根据相关新闻报道及历年发展趋势计算得到。

④由于没有农村 GDP 的统计数据, 笔者按第一产业 GDP 与乡镇企业增加值之和作为估计值。

融的发展正逐渐成熟,中国农村金融得到了健康发展?

显然,单纯地从某些金融指标的变化来衡量金融发展是缺乏说服力的。目前,针对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研究,相关学者大都选择使用农村存贷款、农村金融机构的数量、农村金融深度等农村金融指标,然而由于所选择指标存在单一性,难以全面衡量农村金融的发展程度,因此,需要采用一种综合指标用以直观、准确地测度农村金融的发展程度。本文拟借鉴“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CMM),构建“农村金融成熟度模型”,以1978—2013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成熟度,为全面、直观地了解和把握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趋势及运行情况提供实证依据。

二、文献综述

美国学者Humphrey于1987年首创“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CMM),旨在对某个成熟度级别的软件机构能力进行描述^[1]①。随后“成熟度”的概念与模型被专家学者不断借鉴到各个行业的相关研究当中。例如,Kerzner基于CMM模型理念构建了“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2],美国卡纳基·梅隆大学借助CMM模型提出了“人力资源管理成熟度模型”^[3],李松辉则提出了“区域创新系统成熟度模型”^[4],杨明海又提出了“项目团队效能成熟度模型”^[5]等等。各领域的学者将“成熟度”的概念扩展并形成了新思路,用以动态地、直观地体现研究目标的发展和完善过程。

基于成熟度模型在研究事物形态发展的优越性,部分学者将其引入金融领域,并对此模型进行了改进与创新。刘云生对“金融成熟度”给出了详细定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构建了“金融成熟度计量模型”与指标体系^[6]。任兆璋、刘云生构建了“金融成熟度指数模型”,依据1978—2008年广东省金融运行数据计算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金融成熟度综合指数,研究发现,广东省金融成熟度在不断提高,进一步提高金融成熟度必须注重证券、保险业的发展,着力调整金融结构,提高金融效率^[7]。朱航通过构建“保险市场成熟度模型”,得到2000—2009年我国保险市场成熟度曲线,并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当前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态势及所面临的问题^[8]。

总体来看,用成熟度模型来分析金融领域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采用“金融成熟度模型”分析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研究较少,仅有高新才和常旭红对农村金融成熟度问题进行过局部探讨。其中,高新才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9个省级地区的农村金融成熟度进行了测量并排序,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区域发展不平衡。该研究选取的指标相对单一,且仅采用2006年农村信用社的数据对农村金融成熟度进行测量,研究方法代表性不足^[9]。常旭红采用1998—2012年新疆的农村金融相关指标对新疆的农村金融成熟度进行了横向和纵向分析,对于研究新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来说是新的尝试^[10]。但目前尚未有学者就中国农村金融成熟度问题进行过全面、系统的研究。

综上所述,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研究意义重大,但目前缺乏全面、系统、科学衡量的文献。因此,本文希望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构建“农村金融成熟度模型”进行探讨。考虑到现有文献存在的缺陷,本文将从农村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维度设计13个农村金融指标,并且以1978—2013年中国农村金融运行数据为研究对象,试图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成熟度进行测量,在纵向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农村金融是否逐渐成熟,进而探索中国农村金融是否得到健康发展。

三、农村金融成熟度构造思路

(一) 农村金融成熟度的内涵

本文基于国内外学者对成熟度模型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分析,结合现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认

①Humphrey把“成熟度”划分为5个级别,分别为初始级、可重复级、已定义级、已管理级和优化级^[1]。

为农村金融成熟度是一个国家、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程度,以及该区域金融体系有效运行、协调发展的程度。它综合农村金融发展进程中的多种因素,使用了客观评价体系与系统分析方法,更能全面衡量农村金融发展的真实水平。因此,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一方面包括了农村金融规模增长程度、金融结构优化程度以及金融效率的改善程度,另一方面还包括三者之间协调发展的程度。对农村金融成熟度的测量,可以弥补现有文献仅采用单一指标探讨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的不足。

从理论上来说,农村金融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内生性因素主导模式和外在性因素主导模式。内生性模式下,提升以微观主体为核心的相关指标将对农村金融成熟度起关键性作用。内生性模式下,完善的农村金融创新机制、合理的农村金融主体布局、高效的农村金融机构工作效率,对农村金融成熟度的持续提升都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然而,在农村金融逐步成熟的进程中,如果内在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弱,受外部刺激的影响越来越大,则农村金融会体现为外在性模式。外在性模式下,农村金融发展受农村金融政策的影响巨大,政府部门需要发挥主导力量去推动农村金融改革,提升农村金融成熟度。一般来说,内生性模式在农村金融较发达的地区较为普遍,而外在性模式在农村金融相对落后的地区更加普遍。

农村金融成熟度的提升反过来可以改善农村金融效率,促使农村居民传统的“消费+储蓄”的金融观向新型的“消费+储蓄+投资”转变,还能解决储蓄与投资期限匹配错位等问题,缩短储蓄与投资互相转化的周转时间,提升资本运作效率;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又将继续推动农村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过程正是如此循环渐进的过程。

因此,农村金融成熟度是个动态变化的概念。从时序规律上看,农村金融成熟度提升速度可能不存在不均衡。某个时间农村金融成熟度受农村金融约束或者农村经济低迷等影响,表现为低速上升甚至下降形态;而另一个时间段,农村金融成熟度受农村金融改革以及农村金融创新等促进因素的影响,表现为迅速提高。从影响因素来看,农村金融规模、结构规模、结构、效率等影响因素协调发展体现为农村金融成熟度的快速提高;而农村规模、结构、效率三者之间缺乏协调性则体现在农村金融成熟度提升的停滞不前。

(二) 方法与模型的选择

农村金融成熟度是一个具有动态性、循环性、综合性等特征的概念。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假设某个时期某个地区的农村金融成熟度为 m_i , 结合 CMM 模型的特征, 本文构造出的计算公式如下:

$$m_i = m_0 + (1 - m_0) \frac{P_i - P_{\min}}{P_{\max} - P_{\min}} \quad (1)$$

其中, $i = 1, 2, 3, \dots, n$; P_i 表示某个地区第 i 年的农村金融发展能力; $P_{\min} = \min\{P_i\}$, $P_{\max} = \max\{P_i\}$; m_0 指农村金融发展能力为 $P_{\min}$ 时的成熟度^①。根据公式(1), 我们可以画出农村金融成熟度曲线, 如图2所示。

由上可知, 测量农村金融成熟度的关键在于测量农村金融发展能力 P 的数值。农村金融发展能力是涵盖多个农村金融发展指标的综合性指标, 本文选用主成分分析法(PCA)来对这种具有强相关性的数据进行处理。主成分分析法主要目的是实现降维, 通过对多个指标体系内在结构的整合, 在多指标中筛选出少量几个互相独立的指标进行线性组合(包含85%以上信息)的多元统计方法。

假设某个经济相关问题涵盖 P 个指标, 分别为 $x_1, x_2, \dots, x_p$, $x = (x_{ij})_{n \times p}$ 是标准化后的矩阵, 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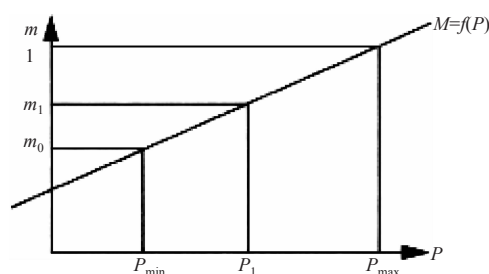


图2 农村金融成熟度曲线

^① $m_0 \in (0, 1)$, 该值可以任意假定, 其结果不影响农村金融成熟度的排序与分析。本研究取 $m_0 = 0.4$ 。

其相关性矩阵为 $R = (r_{ij})_{p \times p}$, 然后, 任取 P 个常熟向量 $L_i = (l_{1i}, l_{2i}, \dots, l_{pi})^T, i = 1, 2, \dots, P$, 则可构建原有变量 $x_1, x_2, \dots, x_p$ 的线性组合 Y_i 。即 $Y_i = \sum_{k=1}^p l_{ki} X_k$, 而且 $\text{Var} Y_i = L_i^T R L_i, \text{Cov}(Y_i, Y_j) = L_i^T R L_j$ 。

一般来说, 统计学理论认为, 变量方差是反应指标变量信息大小的极佳统计指标, 且方差越大则表示所含信息量越大, 方差越小则表示所含信息量越小。因此, 需要确定一切线性组合中方差最大的 Y_i 。假设 R 的特征根为 $\lambda_1 \geq \lambda_2 \geq \dots \geq \lambda_p \geq 0$, 以及对应的正交化单位特征向量为 $e_1, e_2, \dots, e_p$, 则可以根据 $\text{Var} Y_i = \lambda, \text{Cov}(Y_i, Y_j) = 0$ (即 Y_i 与 Y_j 不相关) 来确定。

此时, 第 k 个主成分的贡献率 $b_k = \lambda_k / \sum_{i=1}^p \lambda_i$, 其中 $k = 1, 2, \dots, p$; 前 k 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 $c_k = \sum_{j=1}^k \lambda_j$, 其中 $k = 1, 2, \dots, p$ 。当 c_k 大于 85% 时, 则可以认为这 k 个主成分具备代表性, 能够准确地反映众多原始变量包含的信息^[11]。

此时推算出综合评价模型为:

$$F(X) = b_1 Y_1 + b_2 Y_2 + \dots + b_k Y_k = b_1 e_1^T + b_2 e_2^T X + \dots + b_k e_k^T \quad (2)$$

(三) 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农村金融成熟度的定义可以看出, 要科学地测量出农村金融成熟度的具体值, 必须从农村金融规模、农村金融结构、农村金融效率等三个维度设计指标。

1. 农村金融规模指标: 农村金融规模指标用来反映某农村地区可供使用的金融资源总量。本文选用在大量研究中得以科学验证的一些指标, 如农村存款余额、农村贷款余额、农村保险保费收入、农村保险赔付额、农村金融相关比率^[12-14]①等五个指标。

2. 农村金融结构指标: 农村金融结构不仅涵盖了农村金融资金的配置结构, 还包括农村金融资源分布结构等。本文选用乡镇企业贷款比率、农村金融密度、农村金融从业人员分布密度以及农村金融机构分布密度等指标来衡量。

3. 农村金融效率指标: 农村金融效率分为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 前者体现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能力, 后者主要体现农村金融机构效率。具体来说, 我们选取存贷比、存贷差以及农村贷款不良率作为微观指标, 农村金融深度作为宏观指标。

具体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四)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

表 1 农村金融成熟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	单位
规模 维度	农村存款 (X1)	农业存款 + 农户储蓄存款	亿元
	农村贷款 (X2)	农业贷款 + 乡镇企业贷款	亿元
	农业保险保费 (X3)	—	亿元
	农业保险赔付额 (X4)	—	亿元
	RFIR (农村金融相关比率) (X5)	农村金融总资产②/农村 GDP	%
结构 维度	农村金融机构分布密度 (X6)	农村金融机构③/农村人口	个/万人
	农村金融从业人员分布密度 (X7)	农村金融从业人员/农村人口	人/万人
	农村金融密度 (X8)	农村金融总资产/农村人口	元/人
	LRTE (乡镇企业贷款比率) (X9)	乡镇企业贷款/农村贷款	%
效率 维度	RSLR (存贷比) (X10)	农村贷款/农村存款	%
	农村金融深度 (X11)	累计新增农村贷款/农村 GDP	%
	农村贷款不良率④ (X12)	—	%
	存贷差 (X13)	农村存款 - 农村贷款	亿元

①金融相关率 (FIR) 最初由 Goldsmith 于 1969 年提出, 用以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12], 其后 Ravallion 使用货币存量 (M2) 与 GDP 之比来衡量货币化程度^[13], Lebine 和 Zervos 运用银行信用度量金融发展规模水平^[14]。本文衍生至农村金融相关比率, 运用农村金融资产和农村 GDP 之比来度量农村金融总规模。

②农村金融总资产由农村存款余额、农业保险保费与赔付额构成 (因无法取得农业债券资料, 故本文予以忽略)。

③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包括传统的农村金融机构 (如农村信用社、中国农业银行等) 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如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村金融从业人员统计口径相同。

④由于我国没有对农村贷款不良率进行专项统计, 笔者选用农村信用社数据替代。

年鉴》(1978—2013年)、《中国金融年鉴》(1978—2013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78—2013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1978—2013年)以及中国银监会网站、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等。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得到了表1中各指标变量的实证数据^①。

四、计算过程与结果分析

(一) 计量过程

一般而言,主成分分析都需要对实证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和同向化处理,以消除数据单位不统一现象。本文首先选用标准样本变换法进行数据预处理,标准化公式为:

$$X_{ij}^* = (X_{ij} - \bar{X}) / \sigma_{ij}$$

其中 $i, j = 1, 2, \dots, p$, $\bar{X}$ 为均值, σ_{ij} 为标准差。标准化后的数据均值均为0,方差均为1。然后,我们采用统计软件SPSS20.0计算出有关农村金融发展能力的各个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见表2)。表2数据说明,各指标间的相关性较高,适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表2 各个指标间相关矩阵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	1												
X2	0.98	1											
X3	0.93	0.94	1										
X4	0.92	0.93	0.99	1									
X5	0.82	0.81	0.73	0.74	1								
X6	-0.72	-0.73	-0.49	-0.49	-0.61	1							
X7	0.90	0.91	0.77	0.77	0.80	-0.86	1						
X8	0.99	0.99	0.95	0.94	0.81	-0.69	0.89	1					
X9	-0.58	-0.52	-0.60	-0.59	-0.21	0.13	-0.31	-0.58	1				
X10	0.50	0.38	0.39	0.39	0.15	-0.26	0.33	0.45	-0.77	1			
X11	0.64	0.68	0.56	0.56	0.90	-0.64	0.74	0.64	0.15	-0.19	1		
X12	-0.74	-0.70	-0.68	-0.68	-0.60	0.47	-0.69	-0.73	0.40	-0.46	-0.47	1	
X13	0.97	0.90	0.86	0.85	0.80	-0.66	0.84	0.94	-0.62	0.63	0.55	-0.75	1

我们采用SPSS20.0软件对实证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得到总方差解释表和初始因子载荷矩阵,如表3和表4所示。根据主成分分析法原理,主成分的初始特征值贡献率之和大于85%而且特征值均大于1。由表3的方差解释可知,主成分1和主成分2的累计贡献率大于85%,这两个主成分能较好地反映各个指标的原始信息。

利用表4初始因子载荷矩阵中的值除以每个值对应特征值的平方根(成分1中的值对应的特征值为9.220、成分2中的值对应的特征值为1.999),得到两个主成分中各个指标的系数矩阵,如表5所示。

将表5中各个指标系数运用到各个主成分的线性方程式中,可以得到主成分1和主成分2与原始变量

表3 总的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合计	方差的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	9.220	70.922	70.922	9.220	70.922	70.922
2	1.999	15.377	86.299	1.999	15.377	86.299

注:仅列出了所选取的2个主成分的数据,其他略。

表4 初始因子载荷矩阵

指标	主成分1	主成分2	指标	主成分1	主成分2
X1	0.994	-0.046	X8	0.990	-0.035
X2	0.979	0.049	X9	-0.544	0.774
X3	0.928	-0.100	X10	0.474	-0.760
X4	0.922	-0.092	X11	0.680	0.698
X5	0.847	0.370	X12	-0.773	0.089
X6	-0.723	-0.304	X13	0.956	-0.157
X7	0.919	0.220			

^①由于统计方面的原因,少量指标数据残缺不全。对指标体系中缺失的数据,本文采用热卡填充法、线性回归法以及金融时间序列ARMA模型预测法等数据填补计算对数据进行完善。例如,2010年起《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分类项目进行了调整,取消了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项目,变更为农户贷款、农村企业贷款、农村各类组织贷款,数据出现大幅波动。为保证数据连贯性,本文采用ARMA模型对后三年数据进行预测得出;再如,农村金融从业人员缺乏完整的统计数据,本文通过已有的数据模拟出其占金融从业人员的平均比例,再由历年的金融从业人员乘以该比例计算出农村金融从业人员数量。由于文章篇幅限制,在此不对原始数据一一列出,若读者需要可向笔者索取。

的线性关系表达式:

$$F_1 = 0.3274X1 + 0.3224X2 + 0.3056X3 + 0.3036X4 + 0.2789X5 + 0.2381X6 + 0.3027X7 + 0.3260X8 + 0.1792X9 + 0.1561X10 + 0.2239X11 + 0.2546X12 + 0.3148X13 \quad (3)$$

$$F_2 = -0.0325X1 + 0.0347X2 + 0.0707X3 + 0.0651X4 + 0.2617X5 + 0.2150X6 + 0.1556X7 + 0.0248X8 + 0.5474X9 + 0.5375X10 + 0.4937X11 + 0.0629X12 + 0.1110X13 \quad (4)$$

然后,根据上述式(3)和式(4)的主成分线性表达式以及对应权重进行计算。将上述主成分1和主成分2中的指标系数乘以对应的主成分贡献率,再除以各主成分的贡献率之和。具体计算公式为:

$$T = \frac{70.922}{86.299}F_1 + \frac{15.377}{86.299}F_2 \quad (5)$$

将相关数值代入(5)式,可以得到综合系数 T ,如表5所示。

由表5可得农村金融发展能力的综合得分模型为:

$$P = 0.2632X1 + 0.2711X2 + 0.2386X3 + 0.2379X4 + 0.2759X5 - 0.2340X6 + 0.2765X7 + 0.2635X8 - 0.0497X9 + 0.0325X10 + 0.2720X11 - 0.1980X12 - 0.2390X13 \quad (6)$$

基于式(6),我们发现在测量农村金融发展能力的三类指标规模维度、结构维度、效率维度中,由 $X6$ 、 $X7$ 、 $X8$ 、 $X9$ 代表的结构维度指标贡献相对较弱,由 $X10$ 、 $X11$ 、 $X12$ 、 $X13$ 代表的效率维度指标贡献也较弱,只有农村金融规模维度指标 $X1$ 、 $X2$ 、 $X3$ 、 $X4$ 、 $X5$ 的贡献整体较高。

以式(6)为基础,我们继续将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代入,计算出历年农村金融发展能力 P 及农村金融成熟度 m (如表6所示)。将1978年至2013年的 m 值绘制为农村金融成熟度趋势图,可以动态地、直观地衡量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变化过程(如图3所示)。

(二) 实证结果分析

1. 从整体来看,我国农村金融成熟度呈上升态势,反映了在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进程的大趋势向好,但是个别年份(如1992—1994年)也曾出现

较大波动,甚至出现较为明显的负增长。究其原因,我们发现,农村金融成熟度的几次波动均与农村金融政策的大幅调整有关^①。虽然政策调整带来农村金融成熟度的不稳定,甚至影响了农村金融成

表5 系数矩阵

指标	Z1	Z2	T	指标	Z1	Z2	T
X1	0.3274	-0.0325	0.2632	X8	0.3260	-0.0248	0.2635
X2	0.3224	0.0347	0.2711	X9	-0.1792	0.5474	-0.0497
X3	0.3056	-0.0707	0.2386	X10	0.1561	-0.5375	0.0325
X4	0.3036	-0.0651	0.2379	X11	0.2239	0.4937	0.2720
X5	0.2789	0.2617	0.2759	X12	-0.2546	0.0629	-0.1980
X6	-0.2381	-0.2150	-0.2340	X13	0.3148	-0.1110	0.2390
X7	0.3027	0.1556	0.2765				

表6 1978—2013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能力及农村金融成熟度

年份	P	m	年份	P	m	年份	P	m
1978	-2.6642	0.4000	1990	-1.2034	0.4892	2002	-0.0109	0.5621
1979	-2.4986	0.4101	1991	-0.6894	0.5206	2003	0.4223	0.5885
1980	-2.3159	0.4213	1992	-0.5623	0.5284	2004	0.5932	0.5990
1981	-2.3539	0.4190	1993	-0.7733	0.5155	2005	0.8942	0.6174
1982	-2.3272	0.4206	1994	-1.2561	0.4860	2006	1.1301	0.6318
1983	-2.2516	0.4252	1995	-1.1463	0.4927	2007	1.7568	0.6701
1984	-2.2226	0.4270	1996	-0.7891	0.5145	2008	2.5267	0.7171
1985	-2.1442	0.4318	1997	-0.6014	0.5260	2009	3.8188	0.7960
1986	-1.7184	0.4578	1998	-0.4767	0.5336	2010	4.6969	0.8497
1987	-1.9325	0.4447	1999	-0.4516	0.5352	2011	5.1781	0.8791
1988	-1.6503	0.4619	2000	-0.2489	0.5475	2012	5.5204	0.9000
1989	-1.3978	0.4774	2001	-0.0089	0.5622	2013	7.1580	1.0000

^①查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改革政策变迁历史等资料可以发现,在农村金融成熟度几次发生波动的时期,农村金融环境与政策都出现了大幅调整。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相关政策陆续出台;1990年,创办不以盈利为目的农村合作基金会;1992年,全面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开放;1993年,建立政策性银行,改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组建农村合作社,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决定等。

熟度的持续提高,但是在政策调整中,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能力得以不断增强,因此,从总体来看我国农村金融政策对“三农”的支持及推动作用有明显助推作用。

2. 农村金融成熟度自2007年后快速提高。2006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等)设立,作为增量改革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农村地区正规金融供给

的不足,拓宽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有效缓解了农村金融市场供求双方的矛盾。作为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的新生事物,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被赋予了“服务县域、服务三农、服务小微”的使命。除了追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外,保持“支农支小”的目标定位,不断提高我国农村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覆盖才是其真正目标,由此表现为农村金融成熟度增速显著加快。

3. 对比规模维度、结构维度和效率维度指标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贡献力量,我们可以发现,规模维度的贡献整体高于其他两个维度的指标,说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能力的提升更多依赖于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张。事实上,在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进程中,农村金融市场一直由银行与政府主导,农村金融结构及效率的提高长期滞后于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与规模的扩张,忽视了农村金融发展中规模、结构和效率各影响因素的协调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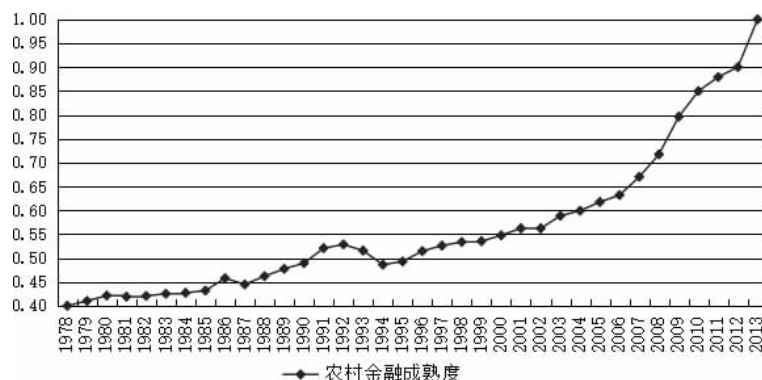


图3 1978—2013年中国农村金融成熟度曲线

五、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分析,农村金融成熟度客观、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政府应继续做好顶层设计,构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普惠金融应特别强调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和深度,即特别要向低端客户(如中低收入者、贫困人口和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政策性金融、农村商业性金融及合作性金融等多种金融机构之间应相互协调合作,共同构建一个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群体)全方位地、有效地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

第二,大力发展微型金融机构,通过加大其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的力度,实现其财务可持续和支农可持续的协调发展。扎根于农村的微型金融要在底端市场运用其人缘、地缘和血缘优势,坚持“支农支小”的目标定位,贷款坚持“小额分散”的基本原则,积极探索并创新适合其所在县域的经济和农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利用微贷技术进行贷款业务创新。这样不仅可以取得较好的盈利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支农效应也在不断增强,从而可以实现二者的平衡。

第三,深化农村互联网金融与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融合及协调发展。凭借多年积累的客户资源、社会公信力以及其网点优势,涉农金融机构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改造其传统业务,利用网上支付、移动支付等简便快捷的支付方式,构建自助银行、电子银行等多种金融服务渠道,逐步向低端市场渗透和移动,提供覆盖广及可持续的金融服务,降低客户获得金融服务的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减少农村金融服务空白区域。不断改变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方式,可以丰富农村金融机构的运营方式,有助于实现农村金融成熟度的提高。

参考文献:

- [1] HUMPHREY W S. Characterizing the software process a maturity framework [R]. Pittsburgh: Carnegie Mellon Software

- Engineering Institute, 1987.
- [2] KARZER H. 项目管理的战略规划——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的运用[M]. 张培华,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
- [3] CURTIS B. People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R]. SEI Joint Program Office, 2001.
- [4] 李松辉. 区域创新系统成熟度的测定与实证研究[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5.
- [5] 杨明海. 人力资源能力成熟度模型[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 [6] 刘云生. 金融成熟度及其评价研究[J]. 金融与经济,2009(12):33-35.
- [7] 任兆璋,刘云生. 广东金融成熟度综合指数研究[J]. 金融研究,2010(3):183-193.
- [8] 朱航. 中国保险市场成熟度指数研究[J]. 保险研究,2013(6):35-42.
- [9] 高新才,李阳. 中国农村金融成熟度测量与研究[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64-75.
- [10] 常旭红. 新疆农村金融成熟度测度研究[J]. 金融发展评论,2014(3):125-134.
- [11] 张尧庭,方开泰. 多元统计分析引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 [12] 戈德史密斯. 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 上海:上海出版社,2006.
- [13] RAVALLION M. Externalities in rur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or China[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2.
- [14] LVEINE R,ZERVOS S. Stock markets, banks, and economic growth[J]. The American Review,1998,98(3):537-5581.
- [15] 蒲勇健. 我国省域金融成熟度的收敛性——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J]. 技术经济,2012(4):104-109.

[责任编辑:黄燕]

The Measurement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n China's Rural Financial Maturity

JIA Li¹, TANG Min², HU Jingjing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2. Guangzhou Rural Commercial Bank,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MM model, with China's rural financial running data from 1978 to 2013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rural financial maturity model to measure and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ural financial maturity in China has maintained an upward trend and accelerates after 2007, but there are fluctuations. The contribution of scale, structure and efficiency to China's rural financial maturity differs a lot, and among them scale dimension plays a key role, which highlights that the features of coordinate development at all levels are ignor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Key Words: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rural financial maturit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hree rural" issues; rural economic growth; rural inclusive finance system